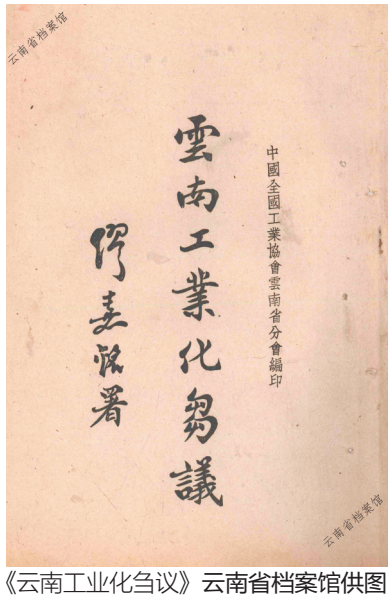


缪云台的《云南工业化刍议》： 历史智慧与当代回响

杨萍



《云南工业化刍议》 云南省档案馆供图

缪云台(1894—1988)，原名缪嘉铭，云南昆明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金融家、政治活动家和民主爱国人士。作为云南省首批公费留美学生，他学成归国后矢志于实业救国，富民兴滇，成为推动云南经济近代化的核心人物。

《云南工业化刍议》(以下简称《刍议》)是1946年缪云台所著，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云南省分会编印，对云南近代的经济环境、资源、工业化步骤、工业化重要性及如何实现作了精炼的概括，短短的几页让人一目了然，他主张发展交通、电力、工业及民营企业来推动云南工业化发展。

历史背景：抗战带来的特殊机遇与战后转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重大历史变局深刻改变了云南的经济地理格局。为保存抗战实力与工业基础，国民政府将中东部地区大量关乎国计民生的骨干工业企业内迁至云南，随之带来了宝贵的建设资金、机械设备、先进技术和工业人才。与此同时，大片国土沦陷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西迁避难，形成了庞大的战时消费市场，军需民用物资需求极其旺盛。这一时期迁入云南(尤其是昆明)

的工业企业，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官营企业为主，辅以部分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多集中于军工、机械、冶金、化工、电力等重工业领域。它们的到来与建设，一方面生产了大量军需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直接催生和促进了云南本土近代工业的兴起，初步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雏形，为云南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然而，1945年抗战胜利后，形势急转直下。随着东部沿海工业基地和港口的迅速恢复，云南失去了战时国际交通枢纽和战略大后方的独特地位，国民政府的工业建设重心随之东移。抗战期间因应战时需求而“井喷式”发展的许多工矿企业，由于缺乏长远的产业布局 and 基础支撑，很快陷入萎缩。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缪云台怀着对云南前途的深切忧思，撰写了《刍议》。他敏锐地指出，云南工业不能因战时特殊条件的消失而“听其自然自灭”，必须谋划长远、固本培元，为西南建设奠定百年之基。

《刍议》的核心观点与战略构想

《刍议》开宗明义，高度概括了云南的战略区位与资源禀赋：“滇省屏障西南，接壤闽、越，北临川、康，东控黔、桂，为国防重镇。土地空旷，气候温润，林畜茂盛，矿藏丰富。经济上可称得天独厚。”基于这一基本判断，缪云台以其留学海外所获得的现代视野和多年主政云南经济建设实践经验，提出了一套系统而务实的工业化方略：

一是交通建设是一切工农业之根本。缪云台深刻认识到现代交通是工业社会的“动脉”。他分析指出，云南河流湍急，水运之利甚微；公路运输适合短途，长途则成本高昂、困难重重。因此，发展铁路交通被确立为“工矿建设中首要之图”。他认为，只有铁路网络畅通，才能使“工业动脉流通”，实现“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进而带动工农业全面繁荣。他明确提出应“藉铁路以发展重工业，利用钢铁以畅交通”，将铁路建设视为云南工业化的基石与先导工程。作为云南经济建设的实际主持者，他虽非具体工程的技术负责人，却通过成功的金

融改革与实业经营，为滇缅铁路等重大交通项目的筹措与推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金保障与战略支持。

二是因地制宜，发展植根本土的现代工业。缪云台始终坚持立足省情、务实发展的原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主持个旧锡务公司时，他便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革管理、开拓国际销售渠道，将个旧锡业从传统的土法生产提升为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产业，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1934年，他倡导成立了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并以此为核心平台，主导投资兴建了涵盖纺织、五金机械、钢铁冶炼、电力、金融、农田水利等领域的55家企事业单位，开创了云南有计划、成体系推进工业建设的先河，其中许多企业成为云南现代工业的摇篮。抗战期间，他更是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内迁带来的技术、人才与资金，推动建设了电气炼钢厂、云南酒精厂、云丰造纸厂、云南水泥厂、裕云机器厂等一系列关键企业，并发展蚕丝、茶叶(“滇红”即诞生于此时期)等特色产品，既有力支援了抗战，又极大增强了云南自身的工业实力。

三是优先开发电力，奠定能源基石。缪云台高度重视能源，尤其是水电对工业化的基础性作用。他对云南的主要河流进行了全面勘查与潜力评估，指出云南虽乏舟楫之便，却拥有全国罕见的优越水力发电条件。他详细列举了螳螂川、澜沧江、怒江、元江等河流的水电开发潜力，预见性地提出“将来普遍开发，则电网可联系全省”。他不仅将水电视为工业动力之源，还前瞻性地提出了“电力灌溉”以促进农业的构想，体现了综合开发的远见。

四是大力鼓励与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在缪云台主政云南经济时期，民营经济曾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刍议》中，他明确主张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凡有国营必要之事业拟请政府迅速举办，其可以民营或应归民营者由政府切实奖励并竭力保障。”他特别建议，对于符合工业化方向的民营厂矿，应在器材进口税、营业税、所得税等方面予以减免，以政策杠杆引导社会游资投向实业领域，激发民间经济活力。在他的推动下，云南的纺织、五金、制药、食品加工等民营企业一度蓬勃发展，形成了官民互补、共同繁荣的局面。

历史意义与跨越时代的对话

《刍议》不仅仅是一篇理论文章，更是缪云台在云南多年实业救国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它所倡导的立足本土资源、注重基础设施、坚持务实渐进、倡导官民协力、关注民生改善的发展哲学，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与省情的、稳健而富有生命力的工业化道路构想。尽管因战后国内形势剧变，内战爆发，社会动荡，缪云台的许多宏伟蓝图未能在那个时代完全实现，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却历久弥新。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可以发现《刍议》中的许多战略预见，正在新时代的云南以新的形式变为现实，形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关于交通：昔日缪云台梦想的“国际大通道”，今日已由中老铁路、中缅国际洋新通道等现代交通网络部分实现，云南正从祖国的西南末梢转变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关于资源转化：昔日依托锡、铜等矿产资源，今日云南利用丰富的水能、太阳能建成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并正将绿色能源优势转化为绿色铝、绿色硅等先进制造业优势。

关于电力：昔日系统规划的水电开发蓝图，今日已在金沙江、澜沧江上建成世界级的水电基地，全省水电装机容量位居全国前列。

关于特色产业：昔日发展的茶叶、猪鬃加工，今日已升级为覆盖茶叶、咖啡、花卉、坚果、中药材的高原特色农业体系，正向“绿色食品牌”国际化迈进。

关于民营经济：昔日倡导扶持民营经济的理念，今日已结出硕果，民营经济撑起云南经济的“半壁江山”，各级政府对标先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一种叫云南的味道”正吸引着各方投资者。

缪云台先生和他撰写的《刍议》，是云南近代化历程中一座重要的精神与思想丰碑。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谱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今天，重温这份历史文献，汲取先贤智慧，对于我们坚定发展自信、把握历史机遇，走好符合省情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缪云台留给云南的，是一笔超越时代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云县知事张肇兴： 勤政爱民 廉洁奉公

刘鸿燕



张肇兴(1872—1918)，字景中，大理人，5岁丧父，母亲宋氏靠纺织抚育其长大。“精长入塾，刻苦自励，性聪颖，所读日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肇兴考中庚子县丑并科乡试解元(第一名)。时逢清政府选派公费赴日留学生，张肇兴入选，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奉派东渡日本，入读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造成师范科。两年后学成回国，历任云南优级师范教习、楚雄师范传习所教习、省会两级师范学堂教习、云南省立第二模范中学教务长，成就者众。后改教从政，历任云南都督府参议，富民、云县、维西等县知事(县长)，由于长期积劳成疾，鞠躬尽瘁，以时疫歿于维西任所，年仅46岁。为官一任的张肇兴，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政绩卓著。他善于施政，拙于谋身，为官清廉，两袖清风，逝后，除存书稿外，几无留物。

1914年冬，张肇兴由富民县知事调任云县知事。其在任云县知事期间，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兴利除弊、倡导文教，鞠躬尽瘁，政声卓著，为民国官吏所仅见者，至今仍深为云县人民所怀念和感戴。

勤政爱民、鞠躬尽瘁。张肇兴在任云县知事三年的时间里，勤政爱民、鞠躬尽瘁、政绩卓著。他尽心竭力地兴利除弊，云县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首先，他积极兴修水利、路桥等基础设施，便民、利民。他亲自勘察并主持兴修南箐河大沟，引南箐河水绕城向北而东，灌溉农田。又沿河道利用南箐河大沟水力兴建碾坊两座，加工稻米，集其收入用以水利维修，不许挪用，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引沟水入城，使旧有的云县消防设施和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其时，云县境内道路崎岖，他督工平治，更主持修建了造福云县、功德无量的南河铁索桥即庆云桥。张肇兴赴任之初，悉知南河年年水患，每年雨季暴涨，冲毁桥梁，商旅断绝，行人强渡，往往溺死。于是召集邑人商议，兴建铁索桥，商定富者捐金、贫者出力，矢志不移。1915年，张肇兴趁干旱季水落积极筹划建桥事宜，从造型设计、筹备资料到组织施工各个阶段，他都亲力亲为，事必躬亲，每日必亲到现场视察督促，及时解决工程中的各种问题。南河铁索桥于1915年12月完工，1917年3月建成开桥。桥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庆云桥



张肇兴撰诗词与鸣琴学社诗稿

本组图片均由云县党史研究室孟锡宏收集整理

明代嘉靖朝“大礼议”事件对云南的影响

彭倩 冯秀英

政治参与度。

其二，几名重要人物因“大礼议”事件与云南结下深刻渊源。非云南籍但与云南联系深厚的杨慎、何孟春等人物的行动，从政治治理体系、社会民生基建、文化学术发展等多个维度，对云南社会影响甚大。杨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明史》卷192有《杨慎传》，杨慎因反对嘉靖帝听取桂萼、张璁等议礼之言，偕同其他官员上疏谏言，被皇帝斥责、停俸，再次疏失失败后，又因与百官在左顺门伏跪哭谏而被廷杖两次，贬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时任修撰一职的杨慎发出“国家养士百五十年，权节死义，正在今日”的呼声，可见其气节和为人。谪戍云南三十余年间，杨慎关心民瘼，积极参与国家与地方事务，例如“闻寻甸安陆、武定凤朝作乱，率僮奴及步卒百余，驰赴木密所与守臣击叛贼”；针对永昌宝石开采中官府与官吏盘剥百姓而造成“石祸”之事，他创作《宝井篇》揭露采宝对百姓的压榨，与好友张含所作《宝石谣》相呼应，发声呼吁关注民生，通过他的影响力间接对当地不合理的采宝贡赋制度形成舆论制压；针对滇池海口频繁疏浚而劳民伤财的问题，杨慎致信云南巡抚直陈利害，成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推动改善地方治理，也留下《海口行》《后海口行》等名作。何孟春，字子元，湖南郴州人，“大礼议”事件发生时，他仍在云南巡抚任上，他反对“议礼”，上疏有言“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明史》卷191《何孟春传》)，因“倡众逞忿”、伏阙谏争而被夺俸，后又贬为南京工部左侍郎。

其三，“大礼议”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云南社会文化发展。包括儒学的发展、人文景观的形成、文化的振兴等。发展儒学，推动书院建设。杨一清对云南文化的影响集中于精神引领与文学风气带动方面。他与云南籍士人交往密切，曾与“大礼议”中反对嘉靖帝主张的云南人毛玉多次唱和赠诗，其人格与文学理念对云南士人形成道德教化。他嘱托杨慎到滇后多讲学育人，间接推动中原学术思想传入云南，促进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杨慎谪居云南时，主要在安宁州讲学，云南巡按郭楠为其修葺书院，提供讲学场所，而他在昆明高峣的讲学场所，成为滇中文化传播的重要之地。从云南走出又回归云南的李元阳，隐居家乡大理

四十余年，专注地方文化建设，著有理学著作《心性图说》，被尊为“滇中理学巨儒”，与之前宣儒的何孟春等一道，让理学之花在滇南开放。他还为大理剑川重修儒学先师庙作记，强调以儒家礼仪教化边民，推动汉礼制文化在民族地区扎根；创办中溪书院，亲自讲学授课，为白族等少数民族打开了学习汉文化的大门。此外，还常与杨慎在苍麓书院讲经论道，使苍麓书院成为培养人才和文化勃兴的重要场所。

宣扬科举，提振文学创作精神。李元阳于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是白族首位翰林庶吉士，为云南人树立了科举榜样，致仕返回家乡大理后寄情于苍山洱海间，与杨士云、杨慎等文化名流诗文唱和，勤于著述，著有诗文集《桤雪台诗》《中溪漫稿存稿》，诗作内容多为关心民生、师友赠答、书写景观。杨慎以状元身份在云南倡导科举，在讲学与交游中培养出一批科举人才，他创作诗词三千余首，著书涵盖经史子集。杨慎引领了云南的文学创作，“滇之东西，他以千里计，及门而受业者恒千百人”，他广交学友，广收门生，接触各阶层的人并结下深厚情谊，使滇中俊秀“杨门七子”(张含、李元阳、杨士云、王廷表、唐铨、吴楚、胡廷禄)在文坛崛起，形成云南文坛的核心力量，在杨慎的带动下，滇云诗文创作蓬勃兴起，滇云文人声名远扬。云南文人著作从明初寥寥几部增至明中后期五十余部，原本相对滞后的云南汉文学创作迎来丰富时期。

采风辑录，兴盛地方文化典籍。以李元阳与杨慎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构建学术体系，掀起云南文化建设的热潮。李元阳主修嘉靖《大理府志》，万历《云南通志》，首创赋役、兵食等志目，系统记录云南科举制度与教育实践，保存了大理山川物产、云南赋役兵食等大量珍贵资料。在《大理府志》中整合鸡足山传说，促进了地方文化传承，而万历《云南通志》更是首部由云南本土学者编纂的省志，成为后世研究云南的重要文献。杨慎谪居云南的三十六年间，与李元阳、张含等云南文人频繁往来，酬

唱之风兴盛。在交往往来间，他编撰《滇程记》《滇载记》《滇候记》《云南山川志》等，系统记录云南风物，开创地方史研究先河。杨慎《席上》诗中“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成为昆明“春城”雅号的来源，增添了昆明的城市文化内涵。杨慎的游记、李元阳的方志系统记录云南地理、经济与民俗，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和文献编纂奠定滇文化的典籍基础，为后世研究西南边疆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融汇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李元阳长于研究云南民族历史，将民族分为焚、彝两类，提出“白人非夷”观点，为民族研究提供新视角。一般认为，杨慎创作了《南诏野史》，保存了云南珍贵民俗资料，实现了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形成了兼具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特色的包容多元的地方文化新形态。

总之，“大礼议”这场政治风波，不仅改变了几位云南籍士人的命运，还意外促成了明代几位重要文人结缘云南，他们形成一种精神和思想场域，在云南的社会文化建设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他们在逆境中坚守文人风骨和文化志趣，不仅塑造了非凡的个人命运，更深刻影响了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大礼议”事件成为促进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交融、推动云南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

(作者分别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教授)